

四读史侧翼



古代印书不易,得书亦难,即便能够买到,书价也非一般寒门士子所能承受。因此,向人借书在古代乃常有之事。正所谓,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书与藏书便有了许多故事,甚至催生了一种文化。

古人如何借书藏书?

■ 金满楼



袁枚画像。 资料图



天一阁是明清时期我国重要的藏书处所。 资料图

借书——“书非借不能读也”

“书非借不能读也。”这是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总结的一句至理名言,至今仍不过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借人之书,还必有期,期限将至,难免心怀惴惴,“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此类心理,袁枚的描述堪称精妙。

据袁枚自述,他从小爱书,可惜家贫难致,只好向人借书阅读,其间难免受人白眼,饱尝了读书人的艰苦和辛酸。当时,某张姓士绅藏书甚丰,袁枚慕名而去,但往借不与,只能望书兴叹。后来,袁枚科举得中并进而为官,有了钱就可以随心所欲买书,后来他的藏书高达40万卷,确实蔚为可观。为了藏书,他还在书斋小仓山房旁建了一座“所好轩”,以收纳从各处搜罗来的众多图书,其好书爱书,可见一斑。

从借书到藏书的经历里,袁枚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读书人穷苦之时,对小心翼翼、好不容易才借来的书总是格外珍惜,因为担心来不及看完就被索回,于是全神贯注,极为用心,如此反而获益良多;相反,如果书是自己的,没有了紧迫感,往往将书束之高阁,任凭灰淹尘漫,还自我安慰说将来日再读,可一旦时过境迁,年老力衰,很多书必将终身未读。

有意思的是,在得书不易的情况下,借书反而成了好学的催化剂。为了更好地消化吸收,很多穷书生借书后往往边读边抄,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幼时家贫,“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明代文学家宋濂在《送东阳马生

序》中回忆自己年少时,“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类似的励志读书故事,在古代可谓比比皆是。

藏书——书积如山的烦恼

对于读书爱书人而言,坐拥书城、饱览群书是他们一生的梦想,而梦想一旦实现,也会带来意外的烦恼。由于好书不易得,加上担心借书人借而不还或有损毁丢失之虞,一些藏书家往往不将好书轻易示人或者干脆就拒绝外借。

客观地说,藏书家的担忧也并非全无道理。毕竟图书一旦出借,各种风险确实难免,如明末清初藏书家曹溶所言:“书既出门,舟车道路,摇摇莫定,或僮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尽非。”为了不让外人知道自己的珍贵书籍,一些藏书家可谓绞尽脑汁,他们甚至连藏书目录也不载入。与曹溶同时期的钱谦益,据说他的绛云楼藏书丰厚,孤本很多,但他的书目有意不录珍贵之书。后来绛云楼失火,一些秘籍葬身火海,连书名都没有保存下来。事后,有人惋惜说,如果绛云楼的秘籍珍本能借出去,或许还能多留几本,“可见书有因借而存者,不借反而损毁者”。

更令人无语的是,一些藏书家视秘籍珍本为无价之宝,如古玩一般看待。一旦秘籍珍本到手,往往“锦锦为衣,扃檀作室,扃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有举世曾不得寓目,虽使人致疑于散佚,不足怪矣”。每每在深夜里,这类藏书家才会偷偷地将这些秘籍珍本从密室搬出,剥去华丽的包裹后独自摩挲抚惜欣赏,画面十分感人。

浙江天一阁是明清时期著名的藏书

楼,始创者范钦去世后,藏书楼封闭甚严,“凡各房锁鑰,分房掌之,禁以书下各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鑰。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櫺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与范钦同时期的昆山藏书家叶盛更有一篇《书櫺铭》,其中曰:“读书勤,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教;借非其人,亦不孝。”借书即为不孝,此举形同绑架后代,难怪清代学者钱大昕也看不下去,说:“借为不孝,过矣!”

共享读书——“不借不如不藏”

本质上说,图书的存在价值就是让人阅读,读过的人越多越好,利用价值也就越高。对一些秘籍珍本而言,不外借固然奇货可居,但失去了初始的意义,这类藏书做法并不值得提倡。如藏书家曹溶所云:“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封己守株,纵累岁月,无所增益,收藏者何取焉?”清末学者梁鼎芬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不借不如不藏”。

不过话又说回来,藏书主要满足个人爱好,借书则近乎一种社会公益,两者有矛盾也有相互促进之处,问题的关键是要形成良好的互动,这才是可持续之道。在古代,藏书人与借书人有个不成文的礼仪,即借书时以一瓶酒相酬,还书时再以一瓶酒相谢,即所谓“借书一瓶,还书一瓶”。瓶是一种贮酒器,肚大口小,大者一石,小者五斗,这或许是古代借书的有偿服务吧。

此外,有些藏书家在借书时也会约定相互借抄,以互通有无。如曹溶在自订《流通古书约》中就规定:但凡向人借书,必带上自己的藏书书目,请书主过目。后者看过后,如有自己想看的书,就约好到对方家中抄录,最好数量能够对等。

当然,历史上也有很多开明的藏书家,他们不但乐于将藏书与读书人共享,有的还免费提供各种服务,让借阅者安心读书。如三国时期的藏书家向朗“开门接宾,诱纳后进”,南齐藏书家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西晋藏书家范蔚更是为读书者“办衣食”。这么好的服务,再不好好读书,未免就说不过去了。



清末进士、学者梁鼎芬主张藏书“不借不如不藏”。 资料图

四地名变迁



『美兰』的N种写法

何以端

梅蓝、梅南、梅林、美男、美南、美蓝……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美兰”,这一地名何来?曾有多少种写法?都是不乏历史与现实意义的话题。

自从20世纪末机场启用,“美兰”这个亮丽地名就浮现于世,数以亿计的中外旅客听到过空乘“Meilan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报站。美兰,这么芬芳优雅的名字怎么来的?又有谁注意到,紧靠机场东隅也有一个叫“mailam”的村子,正是她这个蜚声天下的芳名来源。

据明代正德《琼台志》记载,在明初重设的驿道中就有铺舍“梅蓝铺”,位置与当代“mailam”村相符,可见该村明文记载的历史至少650年。1960年出版的《海南岛十年水利建设》,有一幅全岛水利地图,府城—文昌公路灵山东南的村子,同样标注为“梅蓝”。

梅蓝与美兰,海南话琼文片区的发音,都是“mailam”。

可见,“mailam”村名一直没变,位置也没有变,但文字就多变了。

海南村名有不少是以汉字记录方言发音,因此字面常见参差。其中,琼北诸县以“mai”音节开头的地名很多,常写作“美”,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刘剑三先生认为这是古临高语族群的标志性地名用字,原意是指较低矮的灌木丛。

由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琼北大地震,东线琼文驿道被淹断废弃,清代已经很少再提梅蓝了,只有同治《广东图说》提到城东南二十里的文蔚园,有个“梅南”村。民国初年公路大行,“mailam”因地处要道而再度出名,五花八门的写法出现在各种地图上及文献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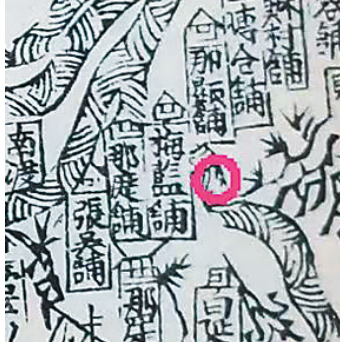
广州中山图书馆藏的晒制蓝图《琼崖交通图》,大约在1920年代后期,这里标注为“美男铺”,说明人们仍记得她的铺舍前身;1930年《海南岛志》中的《海南全岛公路图》,这里标注为“美南”;1939年日军侵琼,又因该村名而设“梅林区公署”。

1988年底,琼山县交通局编印的《琼山县交通志》中的地图,这里标注为“美男”。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0年《海南省综合地图册》之“琼山县图”,这里第一次被标注为“美兰”,此后不少版本地图亦沿用。机场申请立项是海南建省的1988年,其时已拟名为“美兰”,该版地图村名标示应该与此相关。

测绘出版社1995年版《海南省地图册》之“琼山县图”已标示了“美兰国际机场”位置,这里却恢复为“美男”,或许是有意区别。星球地图出版社2011年版《海南省军民两用交通地图册》“琼山图幅”局部,这里首次标为“美蓝市”,该社翌年出版的《海南省军民两用交通地图》中,又恢复为“美蓝”。据说还有场合标示为“母男”的,虽未亲眼见过,但也不足为奇,因为在琼文方言中所有这些写法都是同音。

21世纪之初,“美蓝”还是该行政村的正式名字,2014年之前,该村小学门楼上仍是“美蓝小学”。近年,该村已被明确为美兰区演丰镇管辖的美兰村了,尽管一些知名的卫星地图上,仍可以看到“美兰”和“美蓝”并行不悖。

然而,“美兰”的书面规范写法,无疑最值得提倡。



明代正德《琼台志》舆图上的“梅蓝铺”。 何以端 摄

文史荟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

四文化背影



苏东坡与密州超然台

■ 阮忠

苏东坡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当过太守,那是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当时他39岁。密州在东坡词的创作上有特别的意义。他词创作的起步远晚于诗文,其最早的词是英宗治平元年(1064)写的《华清引·感旧》,熙宁二年(1069)才有第二首词《一斛珠·洛城春晚》,熙宁七年先居杭州时作词渐多,再到密州填词的热度未减,于是相继有悼亡杰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自是一家”的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独占鳌头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仅如此,他在密州修建了“超然台”,写下了千古名篇《超然台记》。

超然台在山东诸城市内,东坡之后,千年来历经风雨,毁修相续,2009年重建,成为诸城八大胜景之首。千年前东坡初到密州时,密州“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因以杞菊为食,他写了《杞菊赋》,其序说:“及夏五月,(杞菊)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赋中

又写道:“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馨噎,举箸噎。”苏辙在《超然台赋序》说哥哥“受命之岁,承大旱之余孽,驱除螟蝗,逐捕盗贼,廪恤饥馑,日不遑给”,和东坡说的密州情形相似。东坡身为密州太守,一度过着这样贫寒的生活。然一年以后的东坡,居然形貌丰满,白发渐黑,他说自己喜欢当地的醇厚风俗,百姓也安于他的管理,于是着手整治当地的园圃,超然台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得到修葺的。

当旧台换了新颜,东坡让弟弟苏辙命名,苏辙在《超然台赋序》里记叙了这件事:合成,东坡“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以告辙曰:‘此将何以名之?’”辙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以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反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器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老子》曰:‘虽有荣

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

苏辙为之命名“超然台”,有自己的学术好尚,他一向喜欢老子,后来还著了《老子解》,不像东坡好庄胜过好老,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名之,说人生处世宜保持内心平静,面对荣华富贵也当不为所动。他借此还有自己的用心,东坡当时在杭州三年不得升迁才到密州。苏辙借老子的话“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有点正话反说,希望他面对贫穷困苦,也不为所动。

东坡在《超然台记》中回应说,苏辙“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他游于物外过着日子,或打猎而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或思亲而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当然,也可沉痛悼妻而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内心悲苦。

苏轼很喜欢超然台,他写了《超然

台记》且不说,还令苏辙、张耒、李邦直、文与可等人各写《超然台赋》,他则为苏辙、李邦直、文与可的《超然台赋》写了跋文,使超然台在当时就名闻遐迩。但是,说“超然”哪能真正地超然呢?他在《密州通判厅题名记》里说:“余性不慎言语,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如是直言不讳,皆出自对世事的深刻关切,并非超然者所为。其后,他因以诗讥讽王安石变法遭了北宋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囚禁而后贬,先贬黄州,晚年再贬惠州、儋州,皆因处在物内而非物外。但他往往在挫折时也能放下,旷达洒脱,让人感到他非凡的超然。

在《超然台记》里东坡还说:“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这是人生的常理,尽管如此,仍无碍世间物有可观,则有可乐。

四读史侧翼



古代印书不易,得书亦难,即便能够买到,书价也非一般寒门士子所能承受。因此,向人借书在古代乃常有之事。正所谓,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书与藏书便有了许多故事,甚至催生了一种文化。

古人如何借书藏书?

■ 金满楼



袁枚画像。 资料图



天一阁是明清时期我国重要的藏书处所。 资料图

借书——“书非借不能读也”

“书非借不能读也。”这是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总结的一句至理名言,至今仍不过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借人之书,还必有期,期限将至,难免心怀惴惴,“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此类心理,袁枚的描述堪称精妙。

据袁枚自述,他从小爱书,可惜家贫难致,只好向人借书阅读,其间难免受人白眼,饱尝了读书人的艰苦和辛酸。当时,某张姓士绅藏书甚丰,袁枚慕名而去,但往借不与,只能望书兴叹。后来,袁枚科举得中并进而为官,有了钱就可以随心所欲买书,后来他的藏书高达40万卷,确实蔚为可观。为了藏书,他还在书斋小仓山房旁建了一座“所好轩”,以收纳从各处搜罗来的众多图书,其好书爱书,可见一斑。

从借书到藏书的经历里,袁枚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读书人穷苦之时,对小心翼翼、好不容易才借来的书总是格外珍惜,因为担心来不及看完就被索回,于是全神贯注,极为用心,如此反而获益良多;相反,如果书是自己的,没有了紧迫感,往往将书束之高阁,任凭灰淹尘漫,还自我安慰说将来日再读,可一旦时过境迁,年老力衰,很多书必将终身未读。

有意思的是,在得书不易的情况下,借书反而成了好学的催化剂。为了更好地消化吸收,很多穷书生借书后往往边读边抄,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幼时家贫,“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明代文学家宋濂在《送东阳马生

序》中回忆自己年少时,“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类似的励志读书故事,在古代可谓比比皆是。

藏书——书积如山的烦恼

对于读书爱书人而言,坐拥书城、饱览群书是他们一生的梦想,而梦想一旦实现,也会带来意外的烦恼。由于好书不易得,加上担心借书人借而不还或有损毁丢失之虞,一些藏书家往往不将好书轻易示人或者干脆就拒绝外借。

客观地说,藏书家的担忧也并非全无道理。毕竟图书一旦出借,各种风险确实难免,如明末清初藏书家曹溶所言:“书既出门,舟车道路,摇摇莫定,或僮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尽非。”为了不让外人知道自己的珍贵书籍,一些藏书家可谓绞尽脑汁,他们甚至连藏书目录也不载入。与曹溶同时期的钱谦益,据说他的绛云楼藏书丰厚,孤本很多,但他的书目有意不录珍贵之书。后来绛云楼失火,一些秘籍葬身火海,连书名都没有保存下来。事后,有人惋惜说,如果绛云楼的秘籍珍本能借出去,或许还能多留几本,“可见书有因借而存者,不借反而损毁者”。

更令人无语的是,一些藏书家视秘籍珍本为无价之宝,如古玩一般看待。一旦秘籍珍本到手,往往“锦锦为衣,扃檀作室,扃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有举世曾不得寓目,虽使人致疑于散佚,不足怪矣”。每每在深夜里,这类藏书家才会偷偷地将这些秘籍珍本从密室搬出,剥去华丽的包裹后独自摩挲抚惜欣赏,画面十分感人。

浙江天一阁是明清时期著名的藏书

楼,始创者范钦去世后,藏书楼封闭甚严,“凡各房锁鑰,分房掌之,禁以书下各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鑰。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櫺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与范钦同时期的昆山藏书家叶盛更有一篇《书櫺铭》,其中曰:“读书勤,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教;借非其人,亦不孝。”借书即为不孝,此举形同绑架后代,难怪清代学者钱大昕也看不下去,说:“借为不孝,过矣!”

共享读书——“不借不如不藏”

本质上说,图书的存在价值就是让人阅读,读过的人越多越好,利用价值也就越高。对一些秘籍珍本而言,不外借固然奇货可居,但失去了初始的意义,这类藏书做法并不值得提倡。如藏书家曹溶所云:“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封己守株,纵累岁月,无所增益,收藏者何取焉?”清末学者梁鼎芬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不借不如不藏”。

不过话又说回来,藏书主要满足个人爱好,借书则近乎一种社会公益,两者有矛盾也有相互促进之处,问题的关键是要形成良好的互动,这才是可持续之道。在古代,藏书人与借书人有个不成文的礼仪,即借书时以一瓶酒相酬,还书时再以一瓶酒相谢,即所谓“借书一瓶,还书一瓶”。瓶是一种贮酒器,肚大口小,大者一石,小者五斗,这或许是古代借书的有偿服务吧。

此外,有些藏书家在借书时也会约定相互借抄,以互通有无。如曹溶在自订《流通古书约》中就规定:但凡向人借书,必带上自己的藏书书目,请书主过目。后者看过后,如有自己想看的书,就约好到对方家中抄录,最好数量能够对等。

当然,历史上也有很多开明的藏书家,他们不但乐于将藏书与读书人共享,有的还免费提供各种服务,让借阅者安心读书。如三国时期的藏书家向朗“开门接宾,诱纳后进”,南齐藏书家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西晋藏书家范蔚更是为读书者“办衣食”。这么好的服务,再不好好读书,未免就说不过去了。



清末进士、学者梁鼎芬主张藏书“不借不如不藏”。 资料图

四地名变迁



『美兰』的N种写法

何以端

梅蓝、梅南、梅林、美男、美南、美蓝……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美兰”,这一地名何来?曾有多少种写法?都是不乏历史与现实意义的话题。

自从20世纪末机场启用,“美兰”这个亮丽地名就浮现于世,数以亿计的中外旅客听到过空乘“Meilan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报站。美兰,这么芬芳优雅的名字怎么来的?又有谁注意到,紧靠机场东隅也有一个叫“mailam”的村子,正是她这个蜚声天下的芳名来源。

据明代正德《琼台志》记载,在明初重设的驿道中就有铺舍“梅蓝铺”,位置与当代“mailam”村相符,可见该村明文记载的历史至少650年。1960年出版的《海南岛十年水利建设》,有一幅全岛水利地图,府城—文昌公路灵山东南的村子,同样标注为“梅蓝”。

梅蓝与美兰,海南话琼文片区的发音,都是“mailam”。

可见,“mailam”村名一直没变,位置也没有变,但文字就多变了。

海南村名有不少是以汉字记录方言发音,因此字面常见参差。其中,琼北诸县以“mai”音节开头的地名很多,常写作“美”,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刘剑三先生认为这是古临高语族群的标志性地名用字,原意是指较低矮的灌木丛。

由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琼北大地震,东线琼文驿道被淹断废弃,清代已经很少再提梅蓝了,只有同治《广东图说》提到城东南二十里的文蔚园,有个“梅南”村。民国初年公路大行,“mailam”因地处要道而再度出名,五花八门的写法出现在各种地图上及文献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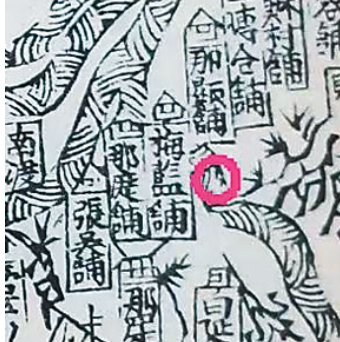
广州中山图书馆藏的晒制蓝图《琼崖交通图》,大约在1920年代后期,这里标注为“美男铺”,说明人们仍记得她的铺舍前身;1930年《海南岛志》中的《海南全岛公路图》,这里标注为“美南”;1939年日军侵琼,又因该村名而设“梅林区公署”。

1988年底,琼山县交通局编印的《琼山县交通志》中的地图,这里标注为“美男”。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0年《海南省综合地图册》之“琼山县图”,这里第一次被标注为“美兰”,此后不少版本地图亦沿用。机场申请立项是海南建省的1988年,其时已拟名为“美兰”,该版地图村名标示应该与此相关。

测绘出版社1995年版《海南省地图册》之“琼山县图”已标示了“美兰国际机场”位置,这里却恢复为“美男”,或许是有意区别。星球地图出版社2011年版《海南省军民两用交通地图册》“琼山图幅”局部,这里首次标为“美蓝市”,该社翌年出版的《海南省军民两用交通地图》中,又恢复为“美蓝”。据说还有场合标示为“母男”的,虽未亲眼见过,但也不足为奇,因为在琼文方言中所有这些写法都是同音。

21世纪之初,“美蓝”还是该行政村的正式名字,2014年之前,该村小学门楼上仍是“美蓝小学”。近年,该村已被明确为美兰区演丰镇管辖的美兰村了,尽管一些知名的卫星地图上,仍可以看到“美兰”和“美蓝”并行不悖。

然而,“美兰”的书面规范写法,无疑最值得提倡。



明代正德《琼台志》舆图上的“梅蓝铺”。 何以端 摄

文史荟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

四文化背影



苏东坡与密州超然台

■ 阮忠

苏东坡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当过太守,那是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当时他39岁。密州在东坡词的创作上有特别的意义。他词创作的起步远晚于诗文,其最早的词是英宗治平元年(1064)写的《华清引·感旧》,熙宁二年(1069)才有第二首词《一斛珠·洛城春晚》,熙宁七年先居杭州时作词渐多,再到密州填词的热度未减,于是相继有悼亡杰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自是一家”的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独占鳌头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仅如此,他在密州修建了“超然台”,写下了千古名篇《超然台记》。

超然台在山东诸城市内,东坡之后,千年来历经风雨,毁修相续,2009年重建,成为诸城八大胜景之首。千年前东坡初到密州时,密州“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因以杞菊为食,他写了《杞菊赋》,其序说:“及夏五月,(杞菊)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赋中

又写道:“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馨噎,举箸噎。”苏辙在《超然台赋序》说哥哥“受命之岁,承大旱之余孽,驱除螟蝗,逐捕盗贼,廪恤饥馑,日不遑给”,和东坡说的密州情形相似。东坡身为密州太守,一度过着这样贫寒的生活。然一年以后的东坡,居然形貌丰满,白发渐黑,他说自己喜欢当地的醇厚风俗,百姓也安于他的管理,于是着手整治当地的园圃,超然台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得到修葺的。

当旧台换了新颜,东坡让弟弟苏辙命名,苏辙在《超然台赋序》里记叙了这件事:合成,东坡“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以告辙曰:‘此将何以名之?’”辙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以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反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器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老子》曰:‘虽有荣

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

苏辙为之命名“超然台”,有自己的学术好尚,他一向喜欢老子,后来还著了《老子解》,不像东坡好庄胜过好老,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名之,说人生处世宜保持内心平静,面对荣华富贵也当不为所动。他借此还有自己的用心,东坡当时在杭州三年不得升迁才到密州。苏辙借老子的话“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有点正话反说,希望他面对贫穷困苦,也不为所动。

东坡在《超然台记》中回应说,苏辙“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他游于物外过着日子,或打猎而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或思亲而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当然,也可沉痛悼妻而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内心悲苦。

苏轼很喜欢超然台,他写了《超然

台记》且不说,还令苏辙、张耒、李邦直、文与可等人各写《超然台赋》,他则为苏辙、李邦直、文与可的《超然台赋》写了跋文,使超然台在当时就名闻遐迩。但是,说“超然”哪能真正地超然呢?他在《密州通判厅题名记》里说:“余性不慎言语,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如是直言不讳,皆出自对世事的深刻关切,并非超然者所为。其后,他因以诗讥讽王安石变法遭了北宋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囚禁而后贬,先贬黄州,晚年再贬惠州、儋州,皆因处在物内而非物外。但他往往在挫折时也能放下,旷达洒脱,让人感到他非凡的超然。

在《超然台记》里东坡还说:“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这是人生的常理,尽管如此,仍无碍世间物有可观,则有可乐。